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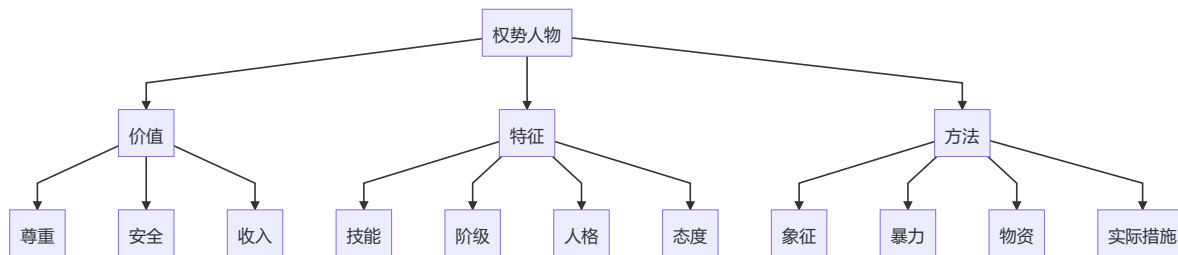
# 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摘要

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 / 2021。

本摘要是原书的摘编，略去了案例的具体分析。

## 第一篇：精英

### 第一章：精英



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

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

决定权势的基础是在那些为了分析目的而选用的价值中所占有的份额。有代表性的价值是尊重、安全和收入。在权势的测定上，没有一个单一的指标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通过连续应用特定的标准，就可能使情况得到澄清。不管使用什么标准，注意力都应集中在权势人物的某些特征上，这些特征可以用阶级、技能、人格和态度等专门选用的词汇来加以描述。精英操纵或驾驭环境的方法即运用暴力、物资、象征、实际措施等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书将以权势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作为开始，而以对权势人物所产生的后果作为结束。

## **第二篇：方法**

---

### **第二章：象征**

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即反对派精英（counter-elite）所谓的“空想”。精英利用各种已经约定俗成的言词和姿态从群众中骗取血汗、劳动、税金、赞扬。

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不需要那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有人为了寻求传播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

任何组织严密的生活方式都要按照自己设计的模式来塑造人的行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必须从人的襁褓时期开始，直到他埋葬入土之日为止，反复地进行灌输。

那些象征有组织社会的标志和用语是人类处于朦胧状态下的早期宝贵历史经验的一部分。

在精英们使用宣传手段时，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就是要选择那些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为的各飞种象征和方法。不断采用的方法常常是重复或分散注意力。

卓有成效的宣传在处理下述情绪方面是灵活多变的：攻击；内疚；虚弱；喜爱。

宣传是通过一些被精英和反对派精英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象征来进行的。但是，集体感情的强度和集体行为的大方向与总分布却是和变化不定的总形势有关的事情。

### **第三章：暴力**

暴力，是精英用以进攻和防御的一种主要手段，它有多种形式。

战争持续的时间缩短了，而且如果不把派向技术落后国家的远征军计算在内的话，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比例也同样缩小了。

一张全面的暴力资产负债表还得加上那些在革命或反革命运动中、在起义中、在执行刑事判决中被杀死的人。

如果我们把练习使用火器与炸药的人和学习兵器教程的人也包括进去的话，暴力的功能还要广泛得多。

显然，把暴力作为一种权势工具而加以合理使用有赖于把暴力行为作为全局中一个方面来看待而对它作出清醒的估价。把它作为一种全面毁灭工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它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人们对残酷行为的喜爱是如此强烈——不论是采取直接满足的形式，还是采取过分偏爱的间接形式以致使暴力的合理使用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

战略著作中总结出来的许多战争原则都强调暴力行动和整体之间的联系。“安全原则”强调与作战有关的各方在整个行动中小心翼翼地确保各自态度始终不变的重要性。

有效使用暴力还包含在整个行动中把破坏力最的优势集中到某些要害部位上的问题。

在寻求优势的努力中，设计出一种既出人意外又有强大破坏力、能使敌人丧失有效抵抗能力的攻势，是每一机警的战略家的梦想。这种梦想被恰当地称为坎尼梦想。

暴力行动的成功取决于整个行动中其他一些突出方面，如组织、宣传、新闻情报之间的相互配合。由于分裂的要求通常出现在那些作为一个整体从国家中分化出来的分子聚居的地方，切实可行的办法通常是将大规模暴力行动推迟到在现存政府中已经成功地组织起另一个政府的时候。

当事先预料到暴力行动对人们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与行动本身的直接客观后果不相称时，在这种情况下暴力行动就变成了“用事实作宣传”。刺杀就是这样的例子。“用事实做宣传”的合适目标是那些干掉此人会使敌人陷于惶恐万状，并会削弱拥护现行制度的人们之统一意志的人物。

与刺杀的情况相同，在恐怖行动中，宣传目标也居于首位。

暴力行动与情报工作相配合的重要性，不亚于与组织工作相配合的重要性，这一点现在已经普遍被接受了。

由于在战争或革命中，执行危险任务都极大地依靠执行人员的动机和技能，因此对人的选择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然是他们对精英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或神话是否忠诚这一点。

革命家们已经学会了更多地依靠少数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那些变化无常的大量浅薄的涉猎者。这就是列宁对革命实践的主要贡献之一。

由于暴力行动使每一个人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可能性，付给金钱报酬的做法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因此要强调“荣誉”，强调颁发嘉奖状和勋章等带有充分神秘力量的做法。

暴力行动的高明使用有赖于社会变化不断地成为影响战斗效能的条件。

暴力只是在正在发展着的形势下为达到某些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方法。对于在行动的成功上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们的态度必须认真加以保护。为了使破坏力量在关键部位上占据优势，必须使暴力行动与组织、宣传、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配合起来。必须对精英的个人代理人给予特别的注意；还必须特别注意任何社会变化对不断变化着的战斗效能所具有的意义。

## 第四章：物资

精英运用物资进行攻击和防卫时所采取的形式是毁坏、扣留、摊派。此外，还有阴谋破坏或停工；罢工、抵制、黑名单、不合作；配给、定价、贿赂。毁坏财产与对人身使用暴力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本章中将不对其进行特别讨论。本章的讨论范围只限于扣留和摊派。

指导物资和服务的流动主要有两种方法，精英就是从这两者的结合中去寻求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把配给制和价格制区分开来讨论。所谓配给，就是以消费或供生产中使用为目的而对特定物资和服务所实行的分配行为。定价则是对物资和服务的非特定需求所实行的分配行为。

现代武装部队广泛地依靠配给制。

在资源的使用中采取配给制度，往往证明效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统治精英更习惯于依靠这种控制人民行动和态度的方法。

配给制最明显的弱点在于它可能使不满情绪集中到那些对实行这种制度一望而知负有责任的统治集团成员身上。

价格制的确具有配给制的许多缺点。当劳动和商品的价格是由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成员所确定时，责任也集中在这些人头上。

然而，价格制可以起到蒙蔽社会眼睛的作用，使人们看不到物资分配的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就减少了公共统治集团或私人统治集团中某一官员被人们视为共同不满的目标的可能性。

不论在苏联还是在美国，定价法和配给法都是可供任何精英使用的方法。

诚然，垄断也要屈服于竞争，但是总的说来历史运动最后总是朝着统治集团的方向运行，不管是公共或是私人统治集团都是一样。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价格要受“行政上的控制”，而不论这个行政统治集团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有没有可能谱写出一部支持对过分刻板的价格和过分灵活的价格加以和平调整，使法定利益与感情利益（vested and sentimental interests）相结合的协奏曲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的巨大不稳定性最近被追溯到私人商业银行任意创造流通手段的问题上。

这种扩大流通手段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建立起一个以不会在同一个时候全部提取的假设作为基础的分散的和金字塔形的庞大权利要求体系。

工业与财政资本主义的这些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宣扬者们显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个人与特定情况之间的联系日益减弱，是与现代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方面。

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从一种权利要求迅速转到另一种权利要求的各种方法的发现。这就形成了权利要求流动性不断增加的局面。

只要所有的银行存款都在同一时间被提取，所有的债券和股票都在同一时间出售，所有的人寿保险单都在同一时间办理退保手续，或者所有的债务或权利要求都在同一时间强迫收交，那么，全部结构就将陷于停摆的状态。经济“大恐慌”中出现的情况恰好就是这种停摆的现象。而这种功能失调的严重程度如何又是与上层结构的复杂程度成正比例的。

过分夸大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倾向也是一种错误。动荡本身同时具有自我破坏和自我缓解两重作用。

在自我恢复这个问题上，是不存在任何事先注定的东西的；现在流行的关于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方案都被迫转而依赖一些在该制度一切障碍存在的条件下能从这个制度内部调集起来的各种动力和技能。

由于统治精英通常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领导群众的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

物资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任何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实际夺得政权之前，控制物资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传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经济方面。

在消费、生产及其他集体活动中拒绝合作向来是被剥削者的一个主要武器。

与敌对的外国精英集团的关系上看，一个精英集团的对外地位要受它对商品和服务的控制情况的严重影响。物资既是战斗潜力的量度，又是战斗效率的工具。

一个特定社会的精英们，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威胁下，只好借助于对基本物资和服务实行先集中控制，然后分散控制；先配给，然后定价的摇摆政策，来达到有时劝诱、有时胁迫、有时转移目标的目的。由于物资和服务集中在公认的精英手中，发起挑战的精英们处在不利地位上。他们以停止合作为手段，增强不满者的权力意志。

## **第五章：实际措施**

任何精英的优势地位都部分地取决于他所采用的实际措施的成功。这些措施包括所有吸收和训练精英的方法和所有在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中所采取的形式。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体现着据认为对政府或社会制度最具根本意义的那些实际措施。立宪主义是对待书面文字效力的一种特殊态度。

由于实际措施是包含在一个变化着的整体中的一些可变的细节，公认的精英可以通过发泄或调整利用它们来保卫自己。发泄是一种无害的解除紧张的办法。

为了达到利用发泄和细小调整来进行防卫这一目的，合法制度可以依靠对其本身的细节进行再安排的方法来实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资本主义国家都曾利用对公共机构进行细小修改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的混乱。民主化和教育的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把注意力从作为基础的财产制度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不满情绪慢慢消失在争取普遍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和自由公共教育制的各种改革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一举把公民选举权的不民主的形式废除掉，而是通过拖了很长时间的一系列微小的进步才完成的。

每一种新的革命类型都有一套专门为了对付居民不安全感而进行细小改革的庞大节目表。

精英地位的维持要靠把效率和可接受性明智地结合起来。为了效率而牺牲可接受性是危险的；而容许对可接受性的暂时考虑去掩盖某些低效率方式的长远危害也是危险的。

对一切传统类型的制定政策与行政管理所作的判断都要求从它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所服务的目的这个角度出发来不断地予以修正。不论所考虑的类型是专政或民主，集权或分权，集中或分散，职能普遍化或有限化，服从性或首创性，倾向性或客观性，过分重视与重视不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都是几乎相等的。

危机要求专政、集权、集中、服从和倾向性。危机的间歇期则允许对民主、分权、分散、首创性和客观性作出让步。

一个新近得到公认的精英集团，在确信它得到了相当普遍的支持时，能够做到使权力的基础民主化，并能在发泄与调整的赌博中把开放与限制当作筹码来使用。

在危机的间歇时期中，特别是在有组织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权力的分散可以按职能线来进行。

革命的反对派精英也碰到某些特殊的问题。一般说，他们的任务在于把暂时的反叛情绪引导到能使反抗长期化并得到加强的行动道路上。

现代革命的战略认为，正确的行动步骤要求训练一批能够抓住革命时机的职业革命家，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群众组织，或在多大程度上主要依靠一些专门使用号召群众的象征的较小型组织，则很难说得清楚。

对于精英和反对派精英来说，明智的做法同样都是，避免对特定策略硬性效忠。集体不安全的消减和增长正以蒙受耻辱的下场威胁着无论什么样的精英集团；紧接着出现的精英集团到一定时候也将被弄得威信扫地。

## **第三篇：结果**

---

### **第六章：技能**

政治分析所关心的不仅是保护或取代权势人物的方法，它还关心那些取得像尊重、安全、收入等各种价值的人们的特点。各种价值在不同技能的代表人物之间如何分配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技能就是某种能教授和能学到的作业方法，它包括使用事物或事物象征的技术（手工工人或工程师的技术），运用仪式象征的技术以及暴力、组织、议价、宣传、分析等技术。

很明显，手艺人 and 一切进行与简单手工操作有关的半技能者是很少有机会跻身显要之林的。

坚持认为英雄人物或幕后权势人物通常来自那些专门从事人的管理而不是物的管理的人们中间，这种看法似乎是合理的。

在人类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暴力技能所占的地位就不需要特别提及了。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战斗者的价值经常被贬低也是于真万确的。

当发生内在与外在的危机时，使用暴力的专家们就得到了一次充满希望的新生。

在某些社会中通往显赫的道路不是战斗而是礼仪。在任何社会中，靠象征维持生活的人中最显著的例子是那些专心搞礼仪活动的人。

讨价还价的技能在商业界和外交界都非常重要，所以值得提出来单独加以考虑。随着对交易条件的各种习惯性限制逐渐趋于消除，现代产业已经使市场竞争的范围大为扩展。

另一种重要技能是辩护，特别是在宣传形式下的辩护。在有些宣传形式中，宣传者的个人信念很重要。在这一点上不仅那些劝人改变信仰的宗教所进行的传教活动是如此，革命运动所进行的宣传也是如此。不过大多数现代宣传却都是在一些对他们的委托人所需之物并没有特殊信念的人指挥下进行的。

另一种重要的象征技能是对人事关系的分析。

智力表现形态存在着几种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的形式。智力艺术从业人员之间的技能斗争表现为下列几种形式：自然主义派对规范派，系统派对印象主义派，解说派对描写派。

## 第七章：阶级

政治分析包括分析事件的阶级后果。阶级就是具有类似的职能、地位与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

革命是精英在阶级构成上的改变。

在精英的阶级结构中发生的突然变化不仅在词汇上而且在实践中带来了许多革新。

世界性革命对于理解两次革命之间所发生的事件是很有价值的指路标。比如法国大革命后的有些事件可以认为是加快了——有些是推迟了——象征和实际措施的新的革命模式在各种具体细节上的传播。有些事件是直接朝着在俄国出现的那种模式运动的。所以可以把发生的事件理解为一次革命与下一次革命中间的过渡。

同一事件，在同上一次和下一次世界革命模式对照起来进行解释时，往往具有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双重含义。

我们研究的是时间的进程，是一个由事件构成的长河。在一定周期的间隔处将这个长河予以横切，并将选定的象征和实际措施的地理分布情况描绘成图，我们就可以对正确理解作出贡献。

在事件长河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横断面上，扩散和限制的程度将会被显示出来。这些关系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 全面扩散
- 地理区分产生的限制
- 部分吸收产生的限制

- 功能区分产生的限制

本章对政治事件可以被看作从一种阶级统治形式向另一种阶级统治形式的转变过程这一观点的含义进行了讨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俄国革命可能标志小资产阶级即技能集团的兴起。下一次重要的革命冲击可能会在体力劳动者反对由社会主义培育起来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名义下到来。与此同时，在俄国夺得政权的精英的影响正受到限制——这同一过程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法兰西精英的影响范围。然而新的革命模式的主要特征正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继续朝着普遍化的方向前进。

## 第八章：人格

政治分析所关心的问题更多是一般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

政治生活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就是冲突的生活，它以一些能使自己与所处环境之间发生积极关系的人作为先决条件。感情冲动必须在人类环境中实现外在化。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人格把一定的动机和一定的技能结合起来，从而把能使冲动外在化的感情能力与足以取得成功的技能融合在一起。

这种感情冲动客观化的要求立刻就会把那些不能做到使感情生活充分自由从而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表现自己的人格排除在杂乱无章的政治舞台之外。

在亲密的范围内遭到失败有利于使追求反应的强烈要求由亲近的小圈子转向更大范围的公众。

在任意胡为威胁周围环境中所取得的成功会养成一种倾向于使用专横暴力的人格。

在集体危机中，受抑制的狂怒型人格常常被解除了他们对破坏性所做的抑制。他们倾向于通过使他们自己与能为集体接受的象征和实践措施结合在一起加强他们的人格。这样他们就能够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而这些运动对性情暴躁的、无法控制的、不耐烦的狂怒型人物却总是闭门不纳的。

部分受抑制的狂怒群可能表现为强烈的受虐狂。

这种极端受虐狂型的人物常常对那些使他们自己的攻击性外在化的攻击型人格无限忠诚、百依百顺。一切拥有优势的领袖的随从中很可能都包括有这种全心全意为“首长”和为“事业”诚心诚意服务的受虐狂人物。

对待内心痛苦的另外一种主要方式是超脱。

在极端的“无情状态”中，行为者本人往往具有一个健全发展的“旁观者自我”，这个“旁观者自我”，似乎能够观察他的精神活动而没有本身被卷入的感觉。如果这样的人格出现在政治中，它经常是作为理论家或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

有些人格是因为傲慢的而不是迫害的态度引人注目的。对傲慢的人所进行的分析说明傲慢态度的功能基础在于对自我轻视所作的斗争。把对自我的轻视转移为对环境的轻视，把客观世界作为可以轻视的东西来对待，该种人格就能够减少内在的危机。

解决因破坏性冲动受抑制而引起的紧张状态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发疯般地 and 强制性地采取行动。

哲学家和研究自然与世界的思想家通常都是来自抑制型人格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鼓动家是在多数方面与哲学家有共同点的政治家。大体上，他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所处的环境都是非常纵容迁就的，但是这种纵容迁就的环境常因突然被夺去而陷于中断。家庭中父母间不稳定的关系意味着感情上欢乐的气候随时有遇到翻天覆地的暴风雨的危险；这样孩子就懂得了怎样对变化不定的人类态度作出敏感的反应。

当危机向暴力方面发展时，不受抑制的狂怒型人物在发泄他们施虐狂的冲动方面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受抑制的狂怒型人物，由于消除了对受报复的恐惧而扩大了他们攻击倾向的活动范围。过分自信型人物也诉诸残忍，虽然这种残忍带有较少的过度残暴性和报复性色彩。在危机的初始阶段，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程度上会出现感情解决方式。在那些由于意见不统一而无法作出决定的地方，和解式人格很受欢迎。一旦达到了紧迫的统一之后，他们就被人们放诸脑后了。在危机的善后时期中，独裁性较小的类型在名望的天平上会增加新的分量。

在经济急速扩展与急速收缩的变化中，当代世界的不安全性日趋严重，它造成了持久性危机的各种条件。这种持久性危机有利于鼓动家夺取权力，有利于使用残酷暴力者保持权力。

## 第九章：态度

各种非常不同的人格形式可能具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可能属于同一个精英集团。政治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忠诚、战略与战术的模型；政治分析有可能对时间长河中相继出现的占优势地位的态度进行十分恰当的考察。

具有最严重政治影响的行为是那些改变社会环境的行为。政治行为由于在它们走向完成的过程中要涉及到环境，因此都是客观化行为。内化行为则只牵涉有机体本身。如果我们在某一段时间内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观察，我们也许会发现他对周围环境给予刺激，反过来他也直接受这一环境的刺激。他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目标定向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紧靠自身的环境失去接触达五分钟之久，我们对他的主观反应的性质就不能决定了。他也许正在解决一个将在未来某种局势中发展成与局势有关的行动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思维就是调整性思维。但是他也可能陷入对他自己的缺点的悲观的反省之中，其结果只能加重他的沮丧心情而不能导致任何会使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维就是我向（全神贯注于自身的）思维。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由研究主体本身表现出来的重要反应。他可能由于胃病、皮肤病或没有任何创伤根据的头痛而变成了在爱情或工作上丧失能力的人。这些反应就是躯体性（身体上的）转变。

目标定向行为；调整性思维；我向思维；躯体性转变——政治家的行为经常表现出一些可以用这些词语简要加以描述的明显变化。

政治本身常常是在其他生活领域中丧失了某些东西后出现的一种替代反应。

在任何社会里，对于每一种剥夺和纵容，各种反应形式都存在着与之相并行的其他同类事件，或与之相背离的不正常事件。我们可以把带有特定事件群特点的序列分离出来。

各种可供挑选的方法可以用下面这种一般形式加以表现：

- 私人内化行动
- 私人外化行动
- 社会内化行动
- 社会外化行动

政治分析部分地涉及到发现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采取行动的问题。一定形势下的行动可以通过注意卷入这次行动的人们过去在类似形势下是如何反应的和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功来部分地进行预测。

在面对面关系中采取极端攻击性行动被发现是有组织抗议的一种替代方法。

一般说，极端攻击性行为者都属于心理变态的人格。

极端顺从听话同样也是有组织抗议的一种替代行动。

了解政治生活逐渐过时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没有“取得成果”的组织使它们的一些成员趋于消极，另一些成员则转向对立的象征与实践措施。比较调查的结果似乎说明，处于任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中的统治精英与普通成员相比流动性要小一些；归根到底，统治者总是能够从他们的法定地位中取得收入、尊重、有时候还有安全这些价值的。他们与他们的职业间建立起来的法定的和感情上的联系比起他们与普通成员间的联系来要更确实得多。

重新调整的问题显然和普遍不安全的程度有关系，这种不安全是把环境的变化解释为予以纵容或予以剥夺的分析方法的一个函数。

讨论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分析类别在研究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特别在研究现代国家体系中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也是适用的。

同样的主要分类也可用于研究对立文化中人们之间发生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有些什么因素可以影响忠诚的地理分布呢？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把许多局部地区居民的忠诚聚集到更大范围社会的象征周围。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是真实的。在民族地位越来越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文化上的差别就可能被扩展为政治上的分离主义。

和遵循地理划分的界线相同，忠诚也可以遵循职能划分的界线。

个人的冲动情绪在什么时候转移到集体象征上去呢？繁荣时期是个人表现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个人计划是在一个仁慈宽厚的世界中形成的。不景气时期或战争时期则是屈从于集体象征的时期。

什么时候最有可能采取和解的或好斗的态度呢？在那些曾经感到内疚与自卑和企图以过度反应来克服顺从倾向的人们中间残酷表现得特别普遍。外化的狂怒型和部分受抑制的狂怒型人物就是在紧张状态下可以预期会采取破坏行动的人们。有内疚感和自卑感并为克服缺乏自信心而进行斗争的精英和社会最倾向于采取无节制的狂怒与集体破坏的行为。

职能象征不时会起来向地方象征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最近一次对地方观念的攻击就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但是西欧文明的其他特点却抵消或正在抵消着这些通过职能道路走向统一世界的号召所取得的成功。西方文明的行动主义、战斗精神和地方观念结合在一起以压倒一切持反对态度的人们。

## 第四篇：概论

---

### 第十章：概论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使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是不能对权势人物作出令人满意的描述的。权势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对诸如尊重、收入、安全等价值的要求上。但是，尊重不见得都归于有钱的人，安全也不一定都归于杰出的人物。显然，如果对权势采用不同的标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政治分析的结果也取决于我们提出来进行探讨的精英的各种特点。本书已经论及技能群、阶级群、人格群和态度群，并且讨论了社会变化对这些群体结构的相对优势所具有的意义。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分析法（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变化的阶级结果上面。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许多同等重要的观察社会生活结果——诸如技能群、人格群和态度群的命运——的方法上转移开。

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部分依靠于它对环境的成功操纵。操纵的方法包括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反对派精英依靠的也是同样的手段。

有一些方法特别适用于精英的进攻，而另一些方法则适用于精英的防御。一个公认的精英集团在控制社会的物资、暴力与实际措施方面占有如此优越的地位，以致一个向它发起挑战的精英集团不得不被迫去主要依靠各种象征。

一个能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去考虑在它自己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宣传。

革命宣传至少有一个历时长久的优点。因为，不满情绪，不论是怎样引起的，都会使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实际措施受到削弱。

如果只是遭受剥夺的话，是不足以产生一次革命的大动荡的。由于技术发展，新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新的纵容迁就的环境也有可能随之形成，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革命才会出现。只有对成功抱有新的自信心才能加强反对剥夺的怨恨。

反复出现的不安全的狂涛不论是怎样引起的，都会对不断革新保持权力和夺取权力的具体方法起到鼓励作用。

通过宣传、暴力，或通过对物资与实际措施的控制，都能诱导群众感情的无害宣泄（精神发泄）。同时，每一种办法还都能使调整得到推进。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是形势不利时，所有这些办法都容易遭受失败。

社会变化的结果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我们已经从技能、阶级、人格、态度等方面对各种精英进行了描述。

某些类型的技能很少有导向显要地位的机会。手工工人、农民、物理科学家、工程师（物的操纵者）远不如人的操纵者那样引人注目。在西欧文明中，暴力的技能、组织的技能、讨价还价的技能和操纵象征的技能一直是很重要的。但是相应的作用却各不相同。在封建时期的欧洲，使用暴力的技能曾是通向权势的主要道路。组织技能曾在实现各民族君主政体的一体化中起过促成结合的作用。讨价还价的技能是在工业扩张的年代中兴起的。在世界发展的最近几次危机中，宣传技能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讨价还价的技能却变得多少有些黯然失色。

新阶级的成长与新技术的发展一样，是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分不开的。新技术是贵族统治衰落和资产阶级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世界革命的创举既部分受到限制，同时又部分被推广和普及。因此，那些在新的政治象征名义下说话的人并没有把世界统一起来。旧世界进行自卫的一种手段就是把与这种模式有关的象征和实际措施部分吸收过来。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在初期表现出许多矛盾形式的统一的世界运动之中。

现代共同控制的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用在私营政策上，也可以用在公共政策上。

如果建立起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控制机制，结果怎样就要取决于职能集团的相对技能和力量了。

目光远大的思想家们已经预测出，终有一天共同控制的机制将与一体化的全国性政策的要求相适应。

阶级分析的文献资料虽然非常丰富，至今却很少有人对社会生活在各种人格类型的相对成功上所具有的意义进行过探索。事件的兴衰起伏有时候有利于这一种，有时候则有利于另一种人格类型。一般地说，政治活动家的主要特点是对尊重抱有强烈的欲望。在政治人物总的模式之中又可以分辨出几种次级类型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尊重的要求强烈到除了同时代人给他以“激动的”反应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满意的鼓动家。作为取得激动效果的手段，他磨炼演讲和撰写论战性报刊文章的技巧。组织者对激动反应的需要比较小，他把更多的力量用于协调人事的活动。和解式的人格来自部分受抑制的狂怒型人格；冷酷无情与专横暴戾的人格则来自外化狂怒型人格。危机有利于鼓动型和冷酷型这两种人格。在最近发生的多次世界经济扩展—收缩危机中这两种人到处可见。在两次危机的中间时期和危机的开始阶段则更多地有利于组织者及和解型人格。

社会的发展可以参照它们对态度群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观察。态度群虽然和其他参照系统有密切关系，但它们却是超越一切参照系统的。极不相同的人格类型可能忠于同样的民族主义主张。极为相似的人格类型可能忠于不同的阶级。擅长使用暴力的人可能是集团意识很强和政治上很坚定的人物。具有工程技能的人在政治上显然不是很积极的。阶级的成功可能受到民族忠诚意识的妨碍。

西欧文明由于某些态度而独具特色，这些态度历经各式各样的地区性发展而得以幸存下来，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欧洲文明是行动主义的：它鼓励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与操纵；它主张使人的感情外化而不是内化。欧洲文明是地区性的：它鼓励像民族主义之类的地方观念并抑制坚持以职能忠诚作为实现普遍统一手段的倾向。欧洲文明具有对暴力的期望；它把战争、革命、分裂、造反、帮派斗争和自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暴力怎样令人痛苦，大多数人都令人悲哀地承受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其他一些文化是决不会把这些事情视作当然的。但是西欧模式目前掌握着人类的大多数。

也许我们时代中最突出的起着统一作用的政治运动就是低收入技能集团正在世界上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在1789年革命创立的世界上，1917年世界革命模式正在部分扩散，部分受着限制。然而深刻透彻的政治分析却能揭露出，在宏伟壮丽的阶级门面后边存在着个人技能、人格类型、个人态度这些附加的、也许更为微妙的对立因素。由此可见，政治学的研究是不能作出一劳永逸的成就和令人满意的肯定性结论的；它能为人们对社会不安全的多变轮廓不断进行的再估价提供某种方向性的尺度。